

在中国民俗学会讲演*

[日]渡边欣雄

出乎意料的演讲经验 除中小规模会议外,在日本,不预先打招呼便突然通知讲演或发表文章的情况很少见,即使对国外著名的研究者也如此,尤其是在“学会”名义的会议上。在中国,情况似乎不同。1993年我获得到中国做研究的机会,来到了中国。如今正在写这篇稿子的我,以北京为根据地,已经走遍中国各地,这些经历将使我终生难忘。但在这些经历中最使我难忘的恐怕还是数次在中国的“讲演”。现在我每天都处在必须准备好去进行突如其来的、频繁出现的讲演报告的紧张状态之中,因为有了第一次的开头,必定就会有第二、三次^①。

从4月到10月半年期间,我做为“东京都交换研究员”来到首都师范大学(原北京师范大学),回国后,从10月下旬起,我做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派遣研究员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我现在的感觉就像于10月中旬回国几天当中,有一次同饭仓照平先生等人在卡拉OK厅“体验异文化”一样,如梦如幻。

10月20日,再次返回北京的我刚要松口气时,突然得到在中国民俗学会上讲演的邀请。这是到首都机场迎接我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刘铁梁先生通知我的,但这次学会讲演并没预先得刘先生的通知。在回国前,我就听说中国民俗学会将于今年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年会。这是5年一次的全国盛会,所以我非常希望参加,借此机会多结交知己,但万万没想到还要讲演。细想一下,这也有道理,因为中国民俗学会本部就设在关照我的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所^②,我前来这里研究民俗学,所以学会本部当然要求我对中国民俗学贡献一下。只不过,我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新变化还一时没有意识到。

刘先生对我说:“什么话题都可以,请您不要推辞。”我心想这真是一个宽容的学会,便决定介绍日本民俗学会的最新研究情况和去年札幌大会上由我主持的研讨会的讨论情况^③。若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也许能完成对中国民俗学会更有益的报告内容。可事到如今,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只能准备这些了。

中国民俗学会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6日,在中央民族学院召开了“中国民俗学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暨第五次学术讨论会”。据说主要因经费问题,这里不能像日本民俗学会那样,每年都召开一次。在中国,1983年成立全国规模的民俗学会时召开了第一次大会,1988年召开了第二次,今年便是第三次。而学术讨论会至1988年只举办过三次,1989年在江西南昌市举办了第四次,今年便是第五次。这次大会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3名学者、收集了学术讨论会报告47篇(确切地说是论文提交数)。外国参加者清一色是日本人,加我共5人。

26日是学会的第一天(前一天是报到日),日程表上印着“理事会、代表预备会、开幕式、学术报告”,对我这个来自外国的初次参加者来说,根本辨不出哪个是“理事会”、哪个是

“代表预备会”。这天上下午的活动都是在中央民族学院主楼大会议室进行的。

由于在大会议室开会，因此我走了进去。当我正要入一般坐席时，有人向我招手示意：您的座位在这儿。仔细一看我的座位在讲台上，座位前还赫然摆着我的名卡。讲台上以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钟敬文先生为中心，两侧依次坐着学会理事和部分大会委员以及来宾。会场座席的排列，就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日本国会”。上午的会实质上是开幕式，我只能一直规规矩矩坐着，认认真真听开幕祝词。

下午是“学术报告会”，这种报告会有别于一般的研究发表会，它相当于日本学会的“讲演”。“学术报告者”除钟理事长外，还有乌丙安常务理事、宋兆麟常务理事及前任日本民俗学会理事的我。讲演时间限制在40分钟至1小时内。讲演情况大致如下。

除我之外，代表中国民俗学会的几位学者讲演的内容大都是关于中国民俗学或有关各国的民俗学研究现状和今后中国民俗学发展方向。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政策下，国内社会变化急剧，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民俗学研究需要高深理论的探讨和多角度的研究。钟理事长和宋常务理事的讲演便指出，我们应不断学习，提高民俗学理论水平，建设高水平的中国民俗学。

乌丙安常务理事的讲演则是关于日本、韩国、德国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民俗学现状。他尤其根据各个国家、地区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及建设民俗博物馆等海外实例，提出了中国民俗学应借鉴的形式。

我庆幸我的话题与乌丙安常务理事的有关联。自1990年以来，日本民俗学会最显著的动向有两个，一是在国内研究方面，从研究历史悠久的日本本土大和民族结社，发展到不断增多对北海道等新开垦地区的“和人”的研究。二是日本民俗学主要以“比较民俗学”的形式加强了对海外的研究。因此，我首先介绍了日本民俗学会整体动态，其后介绍了去年由我主持的内容为从北海道民俗重新审视日本文化的研讨会情况，并简述了其意义。在日本民俗学中，北海道研究的地位正如同中国对东北地区汉族、台湾、华侨及华人世界研究的地位。在发言中，我强调指出正因为这些地区是新开垦地区，所以研究这些地区的汉族在民俗学研究中更显重要，因为在中原，绝对不会解决“什么是汉族”这个问题。只有在汉族意识强烈的移居地，人们才会有意识地保存“传统”概念。我认为若要理解汉族文化，中国民俗学会必须以遍布世界各地的汉族为研究对象。不过，中国民俗学者们能否理解我的主张和体会？对于研究方兴未艾的中国民俗学来说，我想这个问题也许只能有待于21世纪去解决。

参加学会感想 27日大会分三个会场，与会者分别到一个会场里发表论文。区别于日本学会要求报告者站在讲台上发表论文的形式，大家围圆桌坐或并排坐，由会议主持人指名按顺序发表论文。每个会场都有各自的特色，但原则上都不向发表者提问。发表内容既有个人调查体会，又有极其抽象的个人研究方向的理论简述。从发表的形式看，要比日本民俗学会简略得多，但它与日本学会最明显的不同之处是，大多数发表者在会议前就写好了长篇幅的论文，所以参加者能在此获得最新且未刊登的论文资料。

但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民俗学会成立已有10年之久，尚没有学刊，因此学会无法审查、登载收集的论文，也无法以此为学术发展助一臂之力。我认为我们若欲与中国民俗学会共事，就有责任对这种踏实的中国研究活动予以经济援助。当然我个人已向学会捐款，但我更希望的不是个人而是以邻邦学会名义的友好援助。

28日除讲演外，还选出理事与委员的候选人，为第三次选举理事和委员做准备。29日即

会议的最后一天选举了新委员和理事，并在中午举行了闭幕式。新委员的班底至写稿为止尚未明确，理事长则仍是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理事长今年已91高寿，但依然精力充沛，思路敏捷。在讲到中国民俗学会的过去、将来时，幽默不断，引人发笑。我没能结识柳田国男先生，但我想当时柳田国男先生在日本民俗学会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钟老。在钟老的领导下，中国民俗学会齐心协力、不断开拓进取，会员们对中国民俗学会前途充满信心。常听见会员们自称是钟老的第一代弟子或第二三代弟子，他们都乐于将自己置于中国民俗学会的“家谱”中。而我却为此深感担忧，希望他们不要重蹈柳田国男之后的日本民俗学会的覆辙。因为今天日本民俗学会的停滞不前，正体现出过于依赖柳田国男的弟子们的罪过和应负的责任。

中国民俗学会发起于战前的1927年，当时称作“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广州)。那时钟先生还只是中山大学的年轻助教。而时至今日，钟老领导的中国民俗学会是历经风雨后的复苏、繁荣。战后近10年来，在日本一直注视中国民俗学动态的是日本“中国民间故事会”，它是东京都立大学饭仓照平主持的。还有筑波大学民俗学研究室的成员佐野贤治。我到中国后，才了解到这些日中交流情况。“中国民间故事会”之所以与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保持密切关系，是因为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有很多人过去以民间文学研究为中心。在这次大会上，我有时也被误认为“民间文学”研究者，对此我深感遗憾。但不可否认的是，成为“中国民间故事会”会员与成为“日本民俗学会会员”“日本风水研究者会议代表”一样，同样值得荣幸，所以在此，我谨向饭仓照平先生及“中国民间故事会”会员们表示感谢。

* 本文译自日文《中国民话文会通信》第30期(1993.11)。

① 1993年4月到中国后，先后在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历史文献学研究所、中国国家建设部城乡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建筑风水理论进修班”讲演。后受冲绳时代社之托，在报上连载了后者讲演情况。(“冲绳时代”1993年9月2日、3日晨报)又10月末收到北京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讲演邀请。

② 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化研究所建于1993年10月。据称我是建所后的第一个外国访问学者。(编者按：“访问学者”的名称，是近年来才在我国学界正式使用的。)

③ “日本文化思考—北海道视点”的学术研讨会在日本“民俗学会第四十四次年会·札幌大会”上举办。详情请参照《日本民俗学》194期(1993年5月)。 (朱丹阳译)

编者附记——本文作者渡边欣雄，为日本东京都立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专攻东亚细亚比较民俗学。自去年10月起，来北京师范大学民间文学教研室作访问学者，从事我国民间风水习俗的实地调查和研究。教授著有《风水——气的景观地理学》、《民俗知识论的课题》等专书。